

解密中国古代宫廷系列

黄朴民◎主编

对权力“放手”，往往能和富贵“牵手”；  
和权力“牵手”，常常会与性命“分手”。

洞察历代功臣的生存潜规则

# 功臣悲欢

黄朴民 白杨◎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功臣悲欢

黄朴民，白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功臣悲欢 / 黄朴民, 白杨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13-04124-2

I. 功... II. ①黄... ②白... III. 大臣-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0800 号

书 名: 功臣悲欢

作 者: 黄朴民, 白杨 著

责任编辑: 李宁

责任校对: 顾页

制 作: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字 数: 19.2 万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ISBN: 978-7-213-04124-2

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权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所有

[www.ibookuu.com](http://www.ibookuu.com)

# 第一章 江湖风暴恶、信知行路难——专制体制与功臣的生存环境

圈里圈外，戚继光的几多“郁闷”。

祸从口出，高颀的无妄之灾。

贺若弼的口舌生祸。

生死时速，尉迟敬德差一点玩大了。

引火烧身，侯君集无后悔药可吃。

左支右绌，一代名相寇准先生的无奈。

## 圈里圈外，戚继光的几多“郁闷”

### 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戚继光，字元敬，原号南塘，后改为孟诸，嘉靖七年(1528)十月生于山东济宁县南的鲁桥镇，先祖皆为明代将领，六世祖戚详曾参与郭子兴领导的抗元起义军。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戚详仍在明军服役，在攻打云南一役中战死。明王朝追念其功，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检事。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治军严明，精通武艺，袭职之后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戚景通为官清廉，不对权贵阿谀奉承，家境十分清贫。后来，戚景通升任江南运粮把总，因不肯行贿而遭罢黜。

戚继光出生之际，戚景通已经 56 岁，老来得子，自然非常高兴。传说戚继光出生时，夜晚天空上繁星闪光，第二天清晨，朝霞映照着的鲁桥，与房前的红枫及苍松辉映浑然一体。戚景通便将自然界的美好景象与初生男孩的未来联想起来，起名“继光”，希望儿子成人之后能继承光大先祖业绩。

戚继光常年受父亲的熏陶及教诲，深深了解身为武人所必备的文武二道。他 9 岁时便以泥土碎石为垒，削竹子为旗杆，以纸旗为号，指挥颇有条理。12 岁时，戚景通因居室颓圯，请工人修建一座四户两楹的新居。

按当时的规定，将门之家可装 12 扇雕花的门户。工人对戚继光说：“公子应向老爷请示装 12 扇门，以便让房子显壮观啊！”戚继光向父亲请示，没想到遭戚景通的斥责：“你怎能贪营华屋！你能立身守此，以奉祭祀，我就知足了！不然，即使现在是四户，将来也保不住啊。”戚继光大吃一惊，问道：“如何才能做到您说的立身呢？”景通答：“读书！读书在于认识忠孝廉洁。否则，读书也无用！”还有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马上遭来戚景通的一顿训斥，指责他小小年纪就如此奢华，长大之后还不变本加厉！将来成为将官，还不侵吞兵士粮饷！

戚继光的青少年时代并非在安逸中度过。10 岁那年，母亲王氏去世，生活更加拮据。17 岁时，父亲深染重病，命他入京袭官。临行前，父亲对他说：“咱家的家产变卖之后，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谨慎使用。”戚继光说：“儿子当求如何增益，怎么敢浪费父亲大人您的遗产。”到了秋天，戚景通去世，生活的担子由戚继光一肩扛起。

为了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娶妻，家计的负担稍稍减轻。戚继光世袭了登州指挥检事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曾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道出了戚继光的心声，也为他日后的事业埋下了一个伏笔。

## 二、“当今之虎臣，振古之名将”

有鉴于唐代藩镇的跋扈，明代开朝之初即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个世纪的更迭之后，文官集团进入成熟阶段，社会地位也达到了巅峰，武官的地位则跌入了历史的谷底。将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但影响力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丽的文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备供给和军事制度方面难免受到影响。明初，任命军官多以“世袭”的形式子承父业，过了100多年之后，情况有了改变，有志成为军官者只需通过考试，及格便可取得晋升的机会。但是事实上，通过考试而成为高级将领的屈指可数。考试内容着重于刀枪弓马等技术的娴熟与否，完全忽略了军事战略的考查。因此，培养出来的将领皆为一介武夫，缺乏运筹帷幄的谋略，只得任用文官加以指挥。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等均由文官把持。这样的军事体制潜伏着危机，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暴露出明代军事制度的致命弱点。但是，军队情况仍没有得到改进，军事力量持续衰退。文官们认为，只要在他们的任期内天下太平，任何军事改革计划都是多此一举。

明朝规定，常备军由军户提供，每户出男丁一人，代代不变。设立军户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维持兵员的充沛，二是保障民户不受征兵影响。此制度随之而来的流弊是：初期被纳入军户的民户多非出于自愿，或仅限于权宜之计。于是，各个驻兵的卫所里，士兵逃亡的情形屡见不鲜。到了承平时代(除了西北方之外)，各卫所的不少土地被军户变卖，士兵的员额更是严重不足，有些士兵甚至被军官当成仆役或是运输劳工。

与军户制度一样，军队的补给制度也是问题颇多，盘根错节且账目不清，由于无法把补给点与补给线根据情势作一个全盘的规划，所以时常出现供应不足，起初的规定与现实状态格格不入，尽管有局部的修改，但仍无法避免捉襟见肘的窘境。另外，军队的装备也日益落后。明代不缺能工巧匠，但多数被征召至京城为皇帝的禁军制造精美的甲冑，一般的部队只能穿衬以小铁甲的军服。至于武器方面，缺乏统一的规格，由各地府、县制造，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以上种种问题，使明军的作战能力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军备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的情況下，倭寇的侵扰对明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倭寇”不同于海盗，海盗多为乌合之众，烧杀掠夺之后随即呼啸而去；倭寇则不然，除了登陆建立根据地之外，还攻击城池。倭寇的祸害早在元末明初便已初显端倪，至嘉靖年间最为猖獗。明代初期，国力强盛，朱元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等将领在山东至福建的沿海各地修筑城堡，严加防卫，因此未酿成大患。15 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各封建诸侯为了争权夺利，彼此争战不已，在战争中产生的溃兵败将，也就是所谓的浪人便沦为海寇。还有部分日本商人，由于明朝对贸易加以限制，牟利无门，也沦为海盗。然而海盗并非全是日本人，中国人也不在少数，往往还担任高级头目。自宣德年间开始，边将及朝廷中的权贵、宦官大肆侵夺军卫屯田，士族不堪剥削，相继为盗，此外，明代禁止民间海运通商虽有明文规定，但往往无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到达的近陆岛屿就成了走私贸易的港口。在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贸易时纠纷的机制下，10 多名有实力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为后盾，充当仲裁者，逐渐掌握了海上的话语权，成为海盗头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户为据点，自称“五峰大舶主”。当明王朝厉行海禁之时，沿海的一些商人豪富因利益遭受打击，便与流窜海上的海盗商人及倭寇互相勾结。

倭寇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明政府不得不采取较为强硬的策略，然而冲突一开，明王朝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虚弱即刻暴露无遗。一旦与敌交锋，明军将士往往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按嘉靖年间统计，浙江卫所，平均每卫 1104 人，仅是原数 5000 人的五分之一、福建约为二分之一左右，广东也约为五分之一上下。至于战船、哨艇，仅“十存一二”，军伍不振，战守无资，海防之废弛，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沿海军务，主司抗倭。朱纨上任之后首先攻下倭寇巢穴“双屿港”，擒杀通倭商人李光头，之后又在福建擒杀另一头目许栋，并设立了沿海防线。

朱纨在剿寇中处死了一批通倭的商民，引起在朝闽浙官员的强烈反对，因为朱纨断了他们通倭的财路。这些官员诬指朱纨处死通倭商民乃是“擅杀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纨人单势孤，大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朱纨惨遭罢黜治罪，冤恨难平服药自尽。朱纨死后，他一手建立的浙闽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被罢免。自此，“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倭害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从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当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都率兵到这一带驻守，一连五年奔走在登州与蓟州之间。其间，戚继光曾参加会试，适逢鞑靼入侵密云、顺义、通州等地，京城大震，戚继光两次上书，献御敌方略。从此，朝中许多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倍加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信中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

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检事，主管山东的防倭军务。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倭寇的活动规律。当时的船舰以帆船为主，船只的航行及靠岸地点与风有很大的关系。一般而言，倭寇活动最猖狂的时候是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间。掌握了这一规律之后，戚继光便按时按地设防。当时山东防务空虚，纪律松弛，老资格的军官大多轻视这位年轻的将领，其中一位资深军官自恃是戚继光的舅父，屡屡无视戚继光的号令。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他以上司的身份当众处分舅父，事后再以外甥的身份赔罪。经过戚继光的大力整顿，军队风貌迅速得到改善。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戚继光升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1557)，戚继光随俞大猷清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继光被解职，但仍“戴罪办贼”，次年攻下岑港，官复原职。鉴于明军腐败成风，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

招募了一支部队，号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一支崭新的水师建成，同年，爆发了著名的台州战役，戚家军大败倭寇，戚继光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

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倭寇集结约一万余人，大举侵略浙东沿海台州府一带，兵分两路进攻台州和宁海。戚继光闻讯立即亲率主力前往宁海，戚家军行军迅速。到达宁海时，正在烧杀掳掠的倭寇被扼住去路，双方在龙山展开第一波决战，倭寇大败，余部流窜至雁门岭。雁门岭在温州以西，地势显要，易守难攻，戚家军经历一番激战，终于拿下了雁门岭。与此同时，台州县城也是岌岌可危，戚继光立即率领在温州的戚家军回身搭救台州县城。在战斗中倭寇故意将金银财宝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军捡拾，可是戚家军军纪严明，无人去捡。倭寇奸计未能得逞，戚家军一阵冲杀，倭寇溃不成军，戚继光部将陈大成、王如龙乘胜追击，一路追杀到瓜陵江，将倭寇全数歼灭。

嘉靖四十一年(1562)之后，戚继光连续在横屿、牛田、林墩三次战役中大获全胜提升为副总兵，驻守温州、台州、福宁等处。由于连年征战，部队的补给出现问题，戚继光上书请求朝廷给予他“统一浙福之责”，并配以“节制调度之权”。在福建巡抚谭纶的协助下，戚继光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升任总兵，在仙游之役中，以寡击众，大败倭寇，福建境内的倭患，终于得以平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北方外患严重，明王朝决定将戚继光北调，防守长城一线，这为他的戎马生涯开启了新的历程。

尽管任务更艰巨，他仍有雄心创立一番事业，可惜在守旧大臣的阻挠下，朝廷只授予他“神机营副将”一职。第二年，在执政大臣谭纶的保荐下，朝廷任命戚继光管辖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等地的军务，职权相当于总督。自戚继光镇守蓟州之后，经过 10 多年的边疆戍守，北方边境逐渐安定下来。戚继光守边有功，官升至太子太保、左都督，在援辽东一役之后，又加封太子少保。

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在书中，他指出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戚继光抗倭期间还改革了军制，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 3000 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大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使部队的战斗意志高昂。他还摒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术，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调度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部队进入了冷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 三、生不逢时时人惜之

戚继光辉煌的功业，与当时明朝的政治气氛相形之下，近乎是一个奇迹。如果光凭谭纶的支持，戚继光势必无法完成他所有的计划，幸运的是，他在朝廷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世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张居正在戚继光奉命北调前数月被拔擢为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史书中普遍被认为是有雄才大略，一心改革的政治家。他给了谭纶和戚继光极大的支持。

戚继光到蓟州后不久，发现自己有其他将领没有的优势，即他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军备的整治，不必劳心政治上的斗争，因为所有跟政治有关的大事小事都有总督(谭纶)与大学士(张居正)的妥善安排。张居正本欲授予戚继光“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因群臣反对，又因这一官衔前所未有而搁置，但这足以说明张居正对戚继光的信任。授衔不成，张居正又寻找别的途径支持戚继光：他将原镇守蓟州的高级将领一一调离蓟州，以减少戚继光在蓟北重整军备时受到的牵制。

即便是在父亲去世、离职归乡葬父期间，张居正也没有中断对戚继光的支持。为了不让戚继光产生不安全感，他以私人信函告知了预定接替蓟辽总督的人选。该人选乃是梁梦龙，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生之谊，仕途方面也多为张居正提拔，因此张居正在信中说“蓟事已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戚继光对于张居正的如此信任自是不胜感激，为了保证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之行的安全，戚继光派了一个连的鸟銃手做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这些举动表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寻常，也为戚继光悲凉的晚年埋下伏笔。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党同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根据他的才能，而是看他是否是“圈子里”的人。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倾轧不已。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许多功臣名将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前程尽毁，不得善终。戚继光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戚继光的晚年也陷入寂寞与凄凉中。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去世，平日遭张居正贬抑的朝臣群起反扑，纷纷攻击张居正，先前深受张居正支持的戚继光不免也受牵连，一位急欲取代戚继光的部将，四处散布流言飞语。还有人上疏说戚继光“先在闽浙，战多克捷；今来蓟镇未效功能，乞改南，以便其才”。朝廷就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于万历十一年(1583)将戚继光调守广东。此时广东沿海已无倭乱，此番调动对戚继光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履职途中，他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对故乡的眷恋及南调的失落感，让他萌发了归隐山林的念头。

万历十三年(1585)，他以肺病复发为由上书请退。退役之后，戚继光以一种“飞鸟尽，良弓藏”的心情回归故里，在最后的岁月中，他只能靠修立家庙、整理书牋来排遣自己的寂寞和郁愤。临终之前，他的妻子也遗弃了他。曾统帅 10 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

其豪爽的将领，被斥退之后竟至家徒四壁，凄凄惨惨。万历十五年(1587)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悄然去世。

### 点评

戚继光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中国集权专制制度不可破解的怪圈。在“人治”的集权制度下，必然产生山头主义。因为既然要靠人来治理国家，当权者必定启用自己的心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权的顺利运行。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要想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施展自己的才华，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上级张居正输诚纳忠也就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当他通过张居正获得这样的机会之后，实际上也就投靠了张居正的山头，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张居正的人。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张居正轰然倒塌时，他的命运也就注定是个悲剧！也许有人会对戚继光投靠张居正表示不满，责怪他不能保持中立或一心只忠于国家，但看看被弃置数十年、几乎荒废了整个人生的海瑞，就会发现向张居正效忠是他为自己赢得报效祖国平台的唯一途径！

要么他像海瑞那样，以荒废终生为代价，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让后人洒一掬同情之泪；要么他投靠张居正，在实现自己杀敌报国的愿望之后，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弃置——因为山头政治中没有常胜将军，在他投靠张居正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 祸从口出，高颀的无妄之灾

唐太宗和大臣房玄龄等人议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最好的政治家心系国家大业。当年诸葛亮让廖立守边，让李严迁夷地。诸葛亮死后，廖立、李严悲泣异常。如果诸葛亮不是对国家尽心尽力，执法公平，他哪里能得到属下的如此爱戴。高颀身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朝的兴亡与高颀的生死是联系在一起的。朕仰慕前世明君，各位也

要效法这些贤良的大臣啊！”在这里，唐太宗把一个人和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贤相诸葛亮并列，认为隋朝的兴亡与此人的在位、去职和被杀害紧密相连。能在唐太宗心目中有如此地位的人，就是隋朝第一功臣高颀。

## 一、君臣相得挽手共进

高颀(541—607)，字昭玄，隋朝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谋臣。高颀之父高宾曾在北齐为官，因避谗而投奔北周。北周大司马独孤信引其为僚佐，并赐姓独孤氏。高宾官至都州刺史，等到位尊权贵之后，又被追赠礼部尚书、渤海公。

高颀“少明敏，有器局，略涉书史，尤善词令”。高颀幼年时，家中有一棵柳树高达百尺，犹如盖子一样，村中的老人便说：“此家当出贵人。”此话后来果然应验。高颀 17 岁时，被北周齐王宇文宪引为记室。北周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除内史上士，不久又迁下大夫，后因平定北齐有功而官拜开府。宣帝即位后，高颀还追随越王宇文盛讨平隰州稽胡叛乱。

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十一日，宣帝宇文赟病逝。静帝宇文衍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图谋禅代。杨坚知道高颀精明强干，通晓军事，多谋善断，想得到他的辅佐，于是派邗国公杨惠前去示意。高颀预感杨坚今后必成大业，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颀亦不辞灭族。”杨坚十分感动，任命高颀为相府司录。从此，高颀成为杨坚的心腹之臣。

杨坚为预防北周宗室生变，以千金公主将嫁于突厥为借口，诏命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尉迟迥(北周文帝宇文恭外甥)威望素重，杨坚恐有异图就以葬宣帝为名，诏其子尉迟敦入朝，并以韦孝宽为相州总管，赴邺(今河南安阳)取代尉迟迥。尉迟迥因害怕杨坚专权对北周不利，公开起兵反对杨坚。杨坚调发关中兵，令韦孝宽为行军元帅，讨伐尉迟迥。

尉迟迥反叛后，韦孝宽率大军自洛阳进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尉迟迥军此时正围攻怀州（今河南沁阳），韦孝宽立即命宇文述等将其击破，然后率军东进至永桥镇东南。韦孝宽为了歼敌主力，说服诸将避开坚城，引军进屯武陟（今河南武陟西）。这时尉迟迥已派其子尉迟敦率军 10 万进抵武德（今河南武陟东南），在沁水东岸布阵。当时恰好遇到沁水暴涨，两军隔水对峙。杨坚怕诸将不能齐心，打算派崔仲方前去监军，但崔仲方以父在山东为托词，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则说母亲年迈不便远行。正在杨坚为无人可派大伤脑筋之际，高颍自告奋勇请命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委任高颍为监军。

高颍到达前线后，当即命令在沁水架桥、准备发起进攻。尉迟敦从上游放下火筏，企图焚桥；高颍下令士卒在上游构筑水中障碍“土狗”（前锐后广，前高后低，状如坐狗的土墩），以阻止火筏靠近木桥。尉迟敦挥军稍退，准备等韦孝宽的部队渡河，至河中时再发动攻击，韦孝宽乘机令部队擂鼓齐进。全军渡过河之后，高颍又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后撤之心。韦孝宽军奋力猛攻，大获全胜。尉迟敦仅单骑逃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韦孝宽军乘胜追击，直趋邺城。此战，高颍以“土狗”阻拦火筏，对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到达邺城后，尉迟迥把全部兵力集中到城南，准备决一死战。韦孝宽军进攻受挫，被迫撤退。高颍与宇文忻、李询等设计：先射杀那些在一旁的观战者，造成混乱，然后乘势冲击。观战的士民一看自己成了耗子，果然纷纷逃散，喊声震天。宇文忻趁机散布传言，大声呼叫：“贼败矣！”韦军士气大振，乘乱进击，大败尉迟迥军，尉迟迥自杀。至此，尉迟迥举兵 68 天即宣告失败。叛乱平定后，杨坚更信任高颍，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

## 二、辅佐二主统一南国

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总揽北周大权的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是为隋文帝。同月，隋文帝拜高颍为尚书左仆射，进封渤海郡公，朝臣无人能比，以至隋文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高颍知道自己权势甚高，定会招人忌恨，便上表皇帝，请求让位于另一功臣苏威。隋文帝准备同意此事，让其只担任仆射。几天后，隋文帝却说：“苏威曾为前朝服务，高颍推举他，他才有今天的声望。进贤的人理应受赐，怎么能让高颍辞官呢？”又让高颍复职，不久又升为左卫大将军。在这以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高颍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1)，高颍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律，制定新律。新律废除了梟首、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一些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压踝之类。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因为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日久凋残，在苏威、高颍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建新都，高颍为新都大监，“制度多出于颍”。新都的建立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针对当时户口隐漏、人口依附私家的现象，高颍创制了有名的“输籍法”。自北齐以来，很多贫苦农民沦为豪强的荫户，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隋朝建立之初，曾在全国大规模统计户口，使 160 多万人新编入国家户籍。然而高颍认为，单单统计户口是不够的，政府虽然每年按定额征收租调，但军事的调发，徭役、差役的征用，都和户等有关，因此，地方官吏随意划定户等，成为统计户口的最大障碍。为了使农民自愿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高颍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作“输籍定样”，然后将定样颁布到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以 300—500 家组成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即“输籍法”。输籍法实施后，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民，仅仅五六年，户口数就由四五百万户激增至七百万户。国家税收随之增加，很快就“中外

仓库，无不盈积”。高颍创制的“输籍法”，在发展社会经济，增强国力，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军事方面，高颍的表现也很突出。隋朝建国后，虽然政局安定，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仍然面临着两大威胁：北方突厥的滋扰，南边陈朝的虎视。高颍在完成征讨突厥、平定陈朝这两项任务的过程中，又立下了汗马功劳。突厥在边关屡次为患，高颍奉诏镇守边塞，以确保北部边境安全。他不辱皇命，特别是平陈战争，起了重大作用。高颍主张收揽江南朝野人士的人心，瓦解他们的斗志，待条件成熟，大军渡江，一鼓成擒。开皇元年(581)，杨坚根据高颍的推荐，派贺若弼为吴州(今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东部地区)总管，镇广陵(今扬州市)；派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一带)总管，镇庐江(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命他们筹划平陈之事。开皇二年(582)隋军南征，高颍为行军总管，作试探性攻击。出兵后，陈宣帝陈顼死讯传到，高颍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停止进攻，班师回朝，进一步收买了人心，提高了隋朝的声望。

开皇七年(587)八月，隋进兵江陵(今属湖北)，兼并萧梁，扫除了南进障碍。十一月，隋文帝问高颍伐陈之策。高颍说：“江北地寒，收获稍晚；江南气温高，水田庄稼熟得早。我军趁江南收获季节稍稍集中兵马，扬言要出战江南。陈军看到这种情况，必定会屯兵守御，这就可以耽误他们的收获时间。一旦陈军集中军队，我军就解散军队。如此反反复复地这样干，陈军必定习以为常，大意起来。我军再调集军队，陈军也不会相信我军要出兵。在他们犹豫之际，我军乘机渡江作战，士气必定高涨。江南土质不好，房子都是竹子茅草做的，所有积藏，都不在地窖里。我军暗派奸细乘风放火；如修复，则再烧之。如此这般搞它几年，陈国的财力自然就枯竭了。”杨坚按照高颍的设想去做，果然收到了很理想的效果。

开皇八年(588)十月，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台省，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集中水陆军 51.8 万人，

分八路攻陈。高颍时任晋王杨广元帅长史，杨广虽为主帅，但不懂军事，所以“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颍”。十二月，隋军兵至长江，随即发起进攻，各路隋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开皇九年(589)正月二十日，隋军攻入建康(今南京)，俘陈后主陈叔宝。

此战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颍因功加授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锦缎万匹，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高颍提出让位，隋文帝不准，下诏对其褒奖：“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

开皇十九年(599)二月，突利可汗奏报都兰可汗准备攻击大同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实际未亲临前线)，由高颍从朔州(今山西朔县)，尚书右仆射杨素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上柱国燕荣从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分三路进击突厥。四月，高颍命上柱国赵仲卿率兵 3000 为前锋，进至族蠡山(今山西右玉北)，与突厥相遇，连战七日，大破突厥；隋军继续追击至乞伏泊(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再次大败突厥，俘虏千余人，杂畜万计。这时，都兰可汗亲率大军赶到，将隋军团团包围。赵仲卿命部队列成方阵，四面拒战，坚守五天后，高颍率领大军赶到，大破突厥，都兰可汗败逃，后被部下所杀。高颍率军一直追过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越过秦山(今内蒙古大青山)700 余里，然后班师回朝，又立了一大功。

一直以来，隋文帝对高颍十分倚重。高颍深避权势，多次辞让官爵，但都被隋文帝拒绝，足见君臣相得之深。高颍时常坐在朝堂北侧的槐树下处理政事，由于此树不成行列，有司准备将它砍去。隋文帝颁下特命不许砍掉此树。后右卫将军庞晃、卢贲等在隋文帝面前中伤高颍，文帝大怒，将他们全部罢官，并对高颍说：“独孤公犹镜也，